

# 蘇聯、東歐的嚴冬

尹慶耀

早在波蘭實行軍管及戒嚴之前，日本僑民就紛紛從波蘭返國，原因是那裏燃料不足，難捱隆冬。如今，波蘭事件像一道冷鋒掃過蘇聯、東歐，那裏已進入嚴冬季節，那些國家和人民，都會冷徹心底了！

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病，到八十年代就多方面併發了。波蘭的工潮，是一次突出的表現，但早已有人耽心羅馬尼亞會成爲波蘭第二，而捷克可能成爲波蘭第三。波蘭的軍管，或許會收效於一時，但病源不除，病魔就會永遠纏住蘇聯、東歐不放。

馬克思在所著「資本論」等巨構中，對資本主義作了細密而嚴苛的批判，對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只提出幾項烏托邦式的構想，缺乏一個系統化的詳細藍圖，於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一切，就成爲共黨統治下國家的共同模特兒。不過，我們必須說明，所謂蘇聯體制或蘇聯模式，固然創自列寧與史達林，或許還有俄國傳統的若干影響，但基本上仍然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構想所設計而成。

在經濟方面，視私有財產爲剝削之源，主張：（一）生產資料公有制；（二）建立有計劃與自覺的生產組織，這包括以社會管理取代個人管理，以聯合取代競爭；（三）共同使用生產工具；（四）共同協議分配產品，也就可取消交易及貨幣。在政治方面，視國家爲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只有在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上的一切不平等才會消失，那時候國家政權及一切強制性的法規也就歸於消滅，國家就會消亡。但在此以前，無產階級國家要實行專政，消滅反抗者，以保證共產主義的實現。

右述馬、恩的理想，蘇聯都曾付諸實施，但遭受到嚴重的挫折、失敗後，也經過一些修正，恢復了商業和貨幣，保留了兩種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加自留地（蘇聯稱宅旁園地，屬於個人經營部分）。並在此基礎上構築了一個龐大的、

絕對集權的官僚機構。

列寧所創建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金字塔，其專制的程度超越了馬、恩的預料，帶有沙皇時代的遺跡。但如果要實現翻天覆地的革命，把私有制改變成公有制，由社會（這個抽象的東西，必須要國家來代行其職權）來管理偌大的複雜而繁雜的經濟事務，要建立前所未有的共產主義社會，還要培育共產主義新人，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又如何能優爲之？

於是，蘇聯模式就誕生了。在經濟制度方面，是公有公營、中央計劃、集權管理、公定物價，也就是由國家來管理經濟，完全扼殺市場機能。在經濟政策方面，是重重輕輕、忽視農業，低工資、低消費率、高積累率，以人民生活爲犧牲。政府權力無所不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包括思想意識）都嚴加控制。特權的官僚階級誕生，種種浪費、貪污、缺乏效率、阻礙改革，使得整個社會成爲一塘死水。

## 一一

以史達林爲中心，於一九三〇年代定型化的蘇聯社會主義，在經濟方面是低度開發國家型，在政治方面是高度中央集權型，在社會方面是關閉社會型，那可以稱爲蘇維埃式社會主義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東歐被關入鐵幕，那裏的國家在史達林的高壓下，開始蘇維埃化，一切經濟、政治、社會等制度與政策，都效顰蘇聯。但這絕非一個有效的優良體制。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偶像化的史達林死亡，其繼承人對內對外都沒有他那樣的聲望地位，於是馬林可夫（George M. Malenkov）開始改變工業政策，東歐的蘇維埃化也隨之告終。

馬林可夫部分修正了蘇聯重重輕輕的工業政策，部分東歐國家亦步亦趨。東德政府於一九五三年六月九日通過決議，十一日公布，其新方針即倡言改變重工業中心政策，並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但十六日又發表工人的標準工作量不變，招致不滿的東柏林工人示威遊行，要求降低生產指標，被當地蘇聯駐軍出動坦克鎮壓，始告平息。同年七月，匈牙利的納吉（Imre Nagy）出任總理，也改變經濟政策與政治路線，稍稍帶有一些「民主化」色彩。不過，一九五五年二月，馬林可夫辭去蘇聯部長會議職務。在匈牙利，納吉也以右傾罪名去職。當時，東歐的史達林主義者依然挺立，重工業優先政策也牢不可搖。

另一方面，戰後蘇聯由於獲取賠款、劫收物資、舉辦合營公司、從事不等價貿易等特殊條件，使其工業發展相當快捷，五十年代的經濟成長率都是兩位數字，這正是黑魯曉夫要與西方國家從事經濟競賽的依據。但當蘇聯高度工業化、進入開發國家之林，那由史達林所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就漸漸成爲社會進化的桎梏。試看，黑魯曉夫的經濟競賽和反史運動，同是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第二十次大會時所提出，這是否純屬巧合，是頗值得玩味的。

在蘇聯，確實有過一陣「解凍」現象，文藝創造有了與過去不同的面貌，青年男女也開始「西歐化」。然而，那究竟很難徹底衝破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障壁，不容易跳出社會主義的框框。六〇年代初期，黑魯曉夫本人也掀起過文藝整風。

在東歐，波蘭的小史達林——貝魯特（Boleslaw Bierut）於聆聽黑魯曉夫的反史演說後，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二日客死莫斯科。而一九四八年被驅逐、一九四九年以狄托主義者、間諜罪名被捕入獄的戈慕卡（Vladislav Comulka）則於一九五六年四月被釋出。匈牙利的卡達爾（Janos Kadar）也曾以民族共產主義之嫌，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內政部長任內，被匈共頭目拉柯西（Matyas Rakosi）投獄，一九五四年復出。一九五六年的東歐動亂，先是六月間波蘭工業城市波茲南的工人暴動，次是十月間匈牙利利的革命。可是後來，由於國內經濟困難，戈慕卡逐漸又傾向蘇聯。卡達爾統治下的匈牙利，內部實行經濟改革，對外則追隨蘇聯。

### 三

五十年代後半，共產集團的口號是經濟競賽，掀起一陣「趕、超」風。可是，蘇式社會主義制度不良，在競賽過程中更缺點畢露。於是，六十年代中期就進入經濟改革期。改革的重點是將計劃權力下放，以增高企業的自主權；利用利潤指標以提高經濟效率；運用物質刺激，以鼓勵生產情緒；改訂價格體系，部分恢復市場功能。從蘇聯到東歐，各國的經濟改革內容雖不盡相同，效果也並不一致，但其基本方向，却大致有如上述。然而，正如同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說的：「共黨國家的財產（生產資料）是在黨組織手中。雖然這並未予以正式的法定，但黨有權力支配財產。因此，政治階級也是一種擁有階級」<sup>①</sup>。

共黨龐大的黨政機構再加上臃腫的人事配備，是官僚主義的淵藪，也是特權階級的養成所。經濟改革會削弱那個階級的權力，影響他們的既得利益，因而執行改革者常常就是反對改革者，他們對改革政策定然執行不力。更嚴重的是那個公有公營的制度，經營者會碰到很多關、卡和許多無法超越的障礙物，使你的改革難以澈底，也就會效果不彰。如果經濟改革帶動政治自由化（其實這是必需的），那會使整個共黨體制乃至其意識形態發生動搖。在東歐，這還會被蘇聯認為有傾向西方陣營的危險。一九六八年捷克自由化運動，就是在這種情勢下失敗的。

「布拉格之春」是十分短促的，但東歐若干國家的經濟改革並未完全停止，即使蘇聯本身亦復如是。不過，經濟改革已不是主題曲，它似乎已為「經濟合作」所代替。這裏所謂的經濟合作，不僅指「經互會」（COMECON）內部各成員國間的合作，更是指東西兩大陣營間的經濟合作。一九七〇年代，在政治「低盪」聲中，東西貿易增加，貸款、合營企業也隨之增漲。

註① 轉自「吉拉斯看波蘭革命」，臺北，「中國時報」新聞透視，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六日，第四版。

准許出現「大字報」運動，准許出版「民間刊物」，准許「文藝民主」，准許創作和出版「傷痕文學」與「暴露文學」，但是，早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召開第四次「文代」的時候，「極左」派對「文藝民主」的政策即已提出攻擊，爲了討論這個問題，中共曾在一九八〇年二月召開「劇本創作座談會」。在那次會議中，胡耀邦採納了「極左派」意見，要求文藝要注意「社會效果」，並指責沙葉新的劇本「假如我是真的」；但沒有指名批判白樺，因爲白樺是鄧、胡鬪爭「四人幫」的功臣。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共軍方根據「七號文件」，對白樺所寫「苦戀」，展開批判。六月，中共召開「六中全會」，討論了這問題。七月，鄧小平與胡耀邦再不能庇護了，乃被迫公開批判白樺。由此可見，中共政策的轉變，在黨內曾經有過激烈的辯論。「六中全會」以後，中共採取了具體行動：

1. 全面逮捕民主運動活動份子；
2. 發動全面的文藝整風運動，並批判「新馬克思主義」者；
3. 逮捕從事宗教活動的教徒；
4. 嚴禁大陸女子與外籍人士結婚，如「李爽事件」。

而且，在工人方面，中共原來打算讓工人直接管理企業——決定生產水平，分配利潤，僱用和解僱經理，現在也把這計劃「悄悄地取消了」。這些措施，都是爲了要防止波蘭「人民革命」在中國大陸重演。

#### 七、自由發言

李邁先生：

從歷史觀點看，波蘭地處歐洲敏感地帶，易起一葉知秋之象徵性作用。而東歐自由化運動歷史淵源已久，雖此自由化運動常被抑壓而不獲成功，但這些星星之火總是可以指出一個方向，即共產集團開始發生裂痕，最後將導致整個共產政權之崩潰。希望此次波蘭工人的抗議模式能形成一新方式，由共黨控制的工會出現挑戰、反抗的力量，然後再由工會、宗教團體、共黨黨員聯合起來推翻共黨政權。

項士揆先生：

個人以爲波蘭局勢的未來發展有三種可能性：(一)波共鎮壓成功，團結工聯逐漸式微；(二)團結工聯暫時退讓，日後伺機東山再起；(三)團結工聯不顧波共警告，採取激烈對抗措施，導致內戰。(此種可能性已微乎其微矣)

在波蘭局勢演變過程中，舉世一致矚目的是蘇聯是否會出兵干預？個人認爲此種可能性不大。因今日共黨世界較之二次戰後初期已大不相同，蘇聯之意願已無法立刻在東歐國家中得到一致回響；同時阿富汗事件尚未解決，若再介入波蘭，可能引起更大之激盪。因此蘇聯可能採取的措施是雙管齊下：一面暗中全力支持波共政府，一面發動東歐國家予以聲援。

出近二〇%。以產牛乳著稱的波蘭，目前却感到牛乳不足，要靠外國救濟。

這裏要特別提到羅馬尼亞。它本是一個農業國，但爲急求工業化，曾反對黑魯魯曉夫的「國際勞動分工專業化」，以免自己永遠成爲「經互會」國家中的菜園。它在國內採行史達林政策，重工輕農，且以重化工業爲第一優先。七〇年代，它也同波蘭一樣，舉借外債來發展經濟，其結果並不比波蘭更好。又從一九七七年以降，農業連續歉收，一九八一年仍是一個荒年。但爲了償還外債，仍然源源輸出蔬菜、水果、畜產品等。爲了節省能源，使得路燈轉暗，房裏也缺少了溫暖。直到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九日，羅馬尼亞政府才發覺國民無法長期忍受貧乏的生活，因而呼籲確保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並全力提高生產量。此後，才抑制饑餓輸出，增加國內市場的供應，但爲時已晚。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及十八日，羅馬尼亞政府兩次發布命令，規定：(一)對食用油、砂糖、麵粉、咖啡等食品，其購買量不得超過一個月份的需要量；(二)違反禁令者科以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三)對麵粉、玉米粉，規定每人每年的供應量，不得超過。羅馬尼亞政府派人挨戶搜查，取締搶購、囤積。同時命令農村的自由市場(自留地產品市場)，不得任意提高物價。現今，牛肉、牛奶、牛油、乾酪(Cheese)等奇缺，連過去容易買到的雞肉都感覺不足<sup>②</sup>。在波蘭工潮中，羅馬尼亞支持波共立場，也不反對蘇聯的態度，原因就是害怕它自己會成爲波蘭第二。

## 五

農業歉收當然與氣候有關，但也並非如此單純。綜合各方資料，蘇聯現有耕地面積二億一、八二〇萬公頃，國營農場二〇、七六七個，農民一一、四六九、〇〇〇人，集體農莊二五、九六四個，農民一三、六九八、〇〇〇人(一九七九年底)。宅旁園地(副業用自留地)六〇五萬公頃，佔總播種面積二·七%，但所經營農產品則佔全國二八%，計：馬鈴薯佔五九%，雞卵佔三三%，蔬菜三一%，肉類三〇%，牛乳二九%。莫斯科有十個集體農莊市場，那裏可以自由議價，一般而言，較國營商店的公定價高二倍左右，但品質優良，銷路甚佳。

宅旁園地與國營農場及集體農莊土壤和氣候等自然條件相同，但農民自種自收，操作熱心，其單位面積產量常爲公營農場之數十倍。這就反映出集體化制度之不善。

農民保有此極小的私營部分，私有觀念就無法消滅，妨礙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一九七七年蘇聯新憲法草案公布交全國公民

註② 土屋昌也「會成爲第二波蘭嗎？——羅馬尼亞的光榮與悲慘」，日文《世界週報》第六二卷第五〇號，日本人時事通信社V，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八日出版，四〇頁。

討論時，有人主張取消宅旁園地，但布里茲涅夫認爲宅旁園地的副業經營，對社會對個人都有好處，不但未曾取消，此些微的副業經營權，且由農民推廣到一般公民，並由憲法第十三條第二款予以法律保障。又於一九八一年新設蔬菜、水果部，負責該等產品從栽培到保存、加工到運銷等事宜。這是對現實讓步，但並不意味着取消集體化。

戈慕卡時代，波蘭農業集體化政策失敗。現今波蘭農地總面積的七〇%以上，農業總生產的八〇%，都掌握在自耕農手中。但這並不表示波共已放棄社會主義化。南斯拉夫在規定限額內，允許農民私有並買賣土地，且可有一定數額的僱工，它也同樣不會放棄社會主義化。這兩個國家，都希望農業方面國營和合作社營即社會化部門能有較好的成績，可以吸引個體農民走向社會化。因而在政策上對社會化與非社會化部門的農業，就有了差別待遇。例如，機械、農藥、肥料等農業資材都優先供應社會化部門，產品運銷方面也特別給予便利等等。

進入七〇年代，波蘭的吉瑞克政權集中投資在重工業方面，對農業機械、農藥、化肥的生產加以忽視。工業投資優先，將農村青年大量吸引到城市，農村裏由女性從事耕作。又因未能改良土壤、有效提高農業生產的農機缺乏，只好以一八五萬頭馬來代耕。如此原始型的農業生產方式，無法促使農業增產。波蘭肉價若干年未加調整，過度低廉誘使人民大量吃肉，每年須輸入五〇〇萬噸穀物作飼料，那是需要政府財政補貼的<sup>③</sup>。現今肉類漲價在先，其他物價也隨之上漲，商店供應短缺，黑市價格爲官價的十倍，人民手中的十個茲羅提就變成爲一個，他們如何生活得下去？

農業方面保加利亞也許比較好些，這也是相對的說法。當波蘭人民作購物旅行到達保加利亞後，保共政府從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起，就禁止對外國旅行者出售牛肉、砂糖、食用油、麵粉、米等；乳製品、食品罐頭、紅茶、咖啡輸出，則課徵三〇〇%的稅，以防影響其國內的食品供應。

## 六

波蘭是東歐有數的產煤國家，每年產煤二億噸以上，輸出四、〇〇〇萬噸。但從一九八〇年起不斷罷工的結果，產量大幅下降，一九八一年已不滿一億噸。這不僅影響到它的外匯來源，國內取暖也缺乏燃料。捷克也由於波蘭的煤炭和來自羅馬尼亞的電力供應不足，從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起，就將主要產業的電力供應削減二%。東德和南斯拉夫也對波蘭的煤炭供應感到絕望，不得不轉向西方尋求能源，因而使其對西方的債務急劇增加。

註③

「波蘭農業新生——『馬力』」，〔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第四面。

波共，還是支持團結工聯。波共深知如果舉行表決，其統治權威必趨瓦解。爲了保持權位，波共主席賈魯塞斯基於十二月十三日下令逮捕團結工會領袖，拘禁了包括前波共第一書記吉瑞克在內的數十名黨政官員，然後宣佈波蘭全面進入緊急狀態，施行全國軍管。

此一情況，已引起全世界的注視。未來的發展，更成爲舉世關懷的焦點。

波蘭是一個悲劇性民族，有着充滿悲劇的歷史。在蘇俄和德國兩大強國之間，不斷的遭到瓜分亡國的命運。二次大戰以後，波蘭人民對蘇俄扶持的傀儡政權，沒有一點最基本的尊重感。共產黨員在波蘭社會中是最沒有地位的人。經過三十五年的統治，波共政權還是沒贏得知識份子、農民、工人和天主教徒的向心力。一九五六年波茲南工人暴動、一九六八年學生騷亂、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六年工人暴動，顯示出波共政權完全缺乏統治的法理權威。

直到一九七七年，大約有八十名教授組成秘密的「巡迴大學」(Flying University)，在普通公寓中教授波蘭真正的歷史文化，震醒了波蘭人民一直擁有的文學和知識天賦。加上社會流動性低，人民改善社會地位的機會愈來愈小；還有波共領導階層，利用特權營私舞弊，漠視民間疾苦，貪污腐化、偏袒及啓用親人，造成了知識份子及人民的不滿。於是波蘭不滿知識份子頭目柯倫(Kuron)利用「社會自衛委員會」(KOR)的組織，積極與工人們聯手抗議，成爲工人運動策略的導師。

又波蘭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信奉羅馬天主教，一九七九年由波蘭人出任教宗(卽若望保祿二世)，使波蘭人民的自尊逐漸復甦。這位教宗第一次返回波蘭故鄉，受到全國各地人民的熱烈歡迎。無神論的共黨，祇有跟着人民表示歡迎。這股宗教的精神力量和知識份子的自由思想，終於在一九八〇年八月的格但斯克工潮中滙聚起來，再加上經濟瀕臨破產，工農生活困苦，終於產生了共產世界第一個自由獨立的團結工會。

#### (一)獨立團結工會要求的目標

一九八〇年八月卅日，波共政府終於與團結工會簽訂了協議，答應了廿一項要求。協議的要點包括：1.將修改憲法、准許在社會主義綱領的基礎上建立新的自治勞工組織，不受黨與政府的控制，其任務是「維護波蘭工人的權利」；2.新工會不得施行政黨功能，也不得對波蘭社會主義基礎有疑義；3.政府尊重新工會的結構與功能，在新舊工會間將不作任何歧視；4.應允增加工資、嚴格管制物價，改善分配機構，確保物品供應。此外，新工會可擁有自己的獨立機關報，並可組織統一罷工委員會。

一九八一年九月由全國卅八個工會支部、九百四十七萬七千名會員所選出的八九二名大會代表，在格但斯克舉行團結工會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根據各種報導和資料顯示，團結工會的最終目標在促成「自主管理共和國」的實現，其基本前提必須使「自主管理成爲國民經濟的基礎」，使「政治多元化，以消除波共一黨獨裁現象」，並使「社會文化思想多元化，以民主主義作爲國家的政治社會基本原則」。政治、社會、經濟的自主管理，可使波蘭成爲自主管理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型態絕不同於蘇聯和其他

目前可能已達七〇〇億。單只波蘭一國，就有外債二七〇億美元而無力償還，使得西方銀行界大傷腦筋。羅馬尼亞的九〇億美元外債未還，新的借款已使西方頗有難色。

蘇聯本身的情況又如何呢？

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成長目標計：基本投資額一〇・四%（年率二%）、國民所得一八%（年率三・四%）、工業生產二六%（年率四・八%）、農業生產一三%（年率二・五%）、國民個人平均所得一六・五%、商品零售額二三%、勞動生產率——工業二三%（年率四・三%）、農業二三%（年率四・三%）。這些指標已較過去降低（請參閱附表），但能否達成，則頗有疑問。

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七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N. A. Tikhonov）在蘇共第廿六次大會報告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案時，指出這個計劃的主要課題是：（一）提高符合發達的國民經濟的國民福祉；（二）促進技術革新與經濟活動的活潑化；（三）合理利用潛在的生產能力；（四）節約資源；（五）提高勞動品質。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布里茲涅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中却大談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困難，他提出那些困難的原因計有：（一）連續三年農業歉收；（二）「國際情勢的複雜化」；（三）勞動力的不足和勞動生產率的停滯；（四）消費資料的流通不够完備；（五）經濟管理機構的缺陷<sup>⑤</sup>。

所謂國際情勢複雜化，布里茲涅夫列舉的有世界經濟狀況惡化，物價高騰。這應該屬於經濟方面。至於他所說的「低盪」過程受到抑制，帝國主義強求軍備競賽，則應屬於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的石油危機，不僅影響了西方，也同樣進入鐵幕打擊了共黨的經濟。在七〇年代，蘇聯也和東歐一樣，從西歐大量進口機械設備，因而它到一九七八年底，也積欠了一八〇億美元的外債，在輸出不振的情況下，那是一項沉重的負擔。政治方面所謂「低盪」受挫，顯然是蘇聯入侵阿富汗的結果。當蘇聯在歐洲部署S—110中程飛彈及波蘭情勢緊張氣氛中，軍備競賽的責任，實不能諉諸西方。美國防部長溫伯格（Casper Weinberger）說蘇聯的實質軍事支出，平均佔其每年國民總生產（GNP）的一二—一四%。其他資料顯示，蘇聯人民每人實質消費水準僅相當於美國的三四・四%、日本的三分之二，比東歐各國還要落後<sup>⑥</sup>。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主席巴依巴科夫（N. K. Baybarkov）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中報告稱，一九八一年工礦業生產增長率計劃指標為四・一%，實績三・四%；國民所得計劃增長率三・四%

註⑤ 參閱野村一雄「在人災與『國際情勢雜化』之前動搖——蘇聯的經濟危機及其對『經互會』的影響」，日文《世界週報》第六二卷第五一號，日本，八時

事通信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一三頁。

註⑥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六日美國參眾兩院聯合經濟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書，調查係依據一九七六年資料。轉自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八日，第九面。



，實績三%。這些實績可爲布里茲涅夫所指的困難作註腳，而那些困難又可使吉洪諾夫所提的低調課題前途暗淡。

## 七

蘇聯現今已不能像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初期那樣剝削其他共黨國家，相反地它還要對它們提供若干援助，以防其崩潰或脫羈。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後，蘇聯與東歐國家的貿易漸與國際市場價格接近，蘇聯從東歐輸入者主要爲工業品，它輸往東歐的則以能源、原料爲主。爲了配合五年計劃，它們之間的商品交易價格，也隨同貿易協定五年改訂一次，該項價格大致是以前一個五年國際市場的平均價格爲依據。一九七三年世界石油價格飛騰，蘇聯對捷克輸出的石油價格就在國際市場價格半價以下。東歐國家大都都依賴從蘇聯輸入的能源，蘇聯能源漲價，它們的經濟發展立即受到打擊。然而蘇聯爲事實所迫，也曾不待五年貿易協定期滿，即中途提高油價，但仍較輸往西方的價格爲低。一九八〇年的「經互會」大會中，蘇聯仍保證截至一九八五年爲止，每年供應東歐石油八、〇〇〇萬噸。又，羅馬尼亞產油量降低，蘇聯也開始對羅供油。

東歐的經濟成長與蘇聯的支持有關。蘇聯廉價提供能源和原料，購買東歐在西方市場賣不出去的工業產品，是東歐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蘇聯輸往東歐的貨值，僅佔其GNP的二%，從東歐輸入的機器，僅佔其全部投資中機器部門的五%，此項貿易即使對蘇不利，亦無大影響。惟蘇聯本身也陷入經濟衰退，情形就不一樣了。

從六〇年代到現在，蘇聯對古巴援助已達一三〇億美元，其中四〇%爲無息貸款，其餘部分也並未完全償還。據傳，蘇聯對波蘭已有五〇億美元的無息貸款，最近波蘭局勢緊張後，又將予以近四〇億美元的貸款。此外，蘇聯國防費佔其GNP一二—一四%，東歐六國平均僅佔其GNP的六%。蘇聯經濟情況惡化後，東歐是不能不受影響的。

蘇聯在大量拋售黃金，對於匈牙利和波蘭申請加入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I.M.F.)保持緘默，對直接介入波蘭問題採取慎重態度，除了若干政治原因外，在經濟上希望西方對東歐分擔一些援助責任，使蘇聯自己得稍卸仔肩，恐也是因素之一。

## 八

波蘭局勢即使不再惡化，經濟重建至少也需要十年以上。東德像「拖油瓶」一樣被西德帶進歐洲共同市場，檢取到不少特殊的便宜，波蘭無法仿效。匈牙利在東歐是一個較好的例子。匈牙利的經濟改革重點是：(一)鼓勵企業追求利潤；(二)尊重企業的主決定權；(三)某種程度地引進市場機能。從一九八二年起，匈牙利將：(一)實施民間企業法，允許從業員三十人以下的私營企業

之設立；(二)將商業用及觀光旅行用雙軌匯率一元化(一九八一年十月實施)，試行恢復通貨的自由交換性(convertibility of currency)；(三)申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及世銀，實施有限度的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所謂有限度，即不脫離「經互會」，在不影響「經互會」體制的限度內自由化。如果過於積極引進與國際價格相聯結的市場機能，或許還會加速本身的通貨膨脹<sup>②</sup>。

匈牙利經濟並非全無問題，除了外債、物價和經濟成長率已接近零等外，還有待遇差距擴大，以及地方重複投資等等。不過，卡達爾是於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當時，取代第二次納吉政府獲得政權，並受到蘇聯的援助，迄今已二十五年，地位相當穩固。匈牙利之採取新經濟體制，始自一九六八年，從那時起迄至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以前，是世界景氣的擴大期，它從西方輸入新機械、新技術，提高向西方輸出的商品品質，進行得相當順利<sup>③</sup>。這些條件都是波蘭所沒有的，西方景氣未恢復，蘇聯經濟衰退，波蘭自力不足，外援難再獲得，而人口則相當於匈牙利的三倍半，因此它不可能仿效匈牙利，倒是匈牙利提防它的工運細菌會感染到自己。

匈牙利的計劃市場經濟，不同於西方的市場經濟。南斯拉夫也不能稱為市場經濟，而應正名為社會主義自管經濟。波蘭團結工聯曾計劃將波蘭變成自主管理共和國，但自管並非一個有效的優良制度，也無法排除共產黨勢力的支配與官僚主義的滋長。近年來，南斯拉夫也正為通貨膨脹和物資不足所苦。由於石油等輸入物資漲價，國際收支惡化，一九八〇年底，南斯拉夫外債已約達一七〇億美元，人民則被物價壓得透不過氣。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南國聯邦政府決定放寬物價管制，規定的有：(一)由企業或生產者自行決定的完全自由價格；(二)必須當局事先核准的認可價格；(三)聯邦和地方政府直接決定的完全統制價格等三種。汽車、家具、電視機、葡萄酒、金、銀等二〇〇種商品價格完全自由化，佔全部商品的三〇%。這一政策從一九八一年一月起實施，不料却被誤解，引起設備投資及工資的不當上昇。於是，政府又不得不介入來管制物價及應付通貨膨脹<sup>④</sup>。所謂自管經濟魅力漸失，波蘭即使採用，也無法挽救其垂危的經濟。

## 九

自黑魯曉夫時代起，共黨集團就提倡增產消費物資、改善人民生活，這自然增高了人民的期望。一旦支票不能兌現，他們就會由失望而不滿。經濟改革是引進部分自由經濟的市場原理及經營管理方式，但在社會主義的統制經濟制度下，改革的效果不彰

註②

「極寒的東歐經濟」(下)，「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五日，第五面。

註③

「日本經濟新聞」駐倫敦特派員村瀨「苦難的經濟改革之途——無法保證匈牙利化」，見該報，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七日，第五面。

註④

「苦惱的南斯拉夫『自管理方式』」，「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三月廿五日，第七面。

，只使人民對那個僵硬的制度更加反對。高壓的專政稍稍放鬆，自由的幼芽就會日漸茁壯。這正是共黨陣營的現實寫照。波蘭的經濟陷入絕境，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經濟也進入隘路。現今還有人相信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嗎？

法國一份以照片爲主專門報導各地風光的雜誌「Paris Match」曾派出八名採訪員前往波蘭，就五〇〇名波蘭一般市民作輿論調查，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廿一日在該雜誌上發表。調查時發出的問題是把歐洲政黨政綱架空提出，詢以：「如果實行自由選舉，你選那個政黨」。其結果顯示的支持率如下：（一）基督教民主黨三四%；（二）社會黨二七%；（三）自由黨一九%；（四）農民黨四%；（五）統一工人黨（波共）三%。

「紐約時報」根據莫斯科知識份子的話報導，在共產黨員之中，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不過一—二%。

中共的「共青團」在大學生中調查的結果，真正信仰馬列主義的不過一〇%。上海市黨委會宣傳部發表的文件透露，就下列幾個問題：（一）社會主義是好的還是壞的？（二）黨的領導是否必要的？（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否充滿活力？來分析大陸青年的思想，結果發現「三信危機」確實存在<sup>⑩</sup>。

蘇聯、東歐乃至整個共黨集團都進入隆冬時期，曠下的問題只是：何日冬盡春來呢！

註<sup>⑩</sup> 以上所引，俱轉自名越健郎「加速走向沒落的波蘭情勢——蘇聯型社會主義的沉重現實」，日文《世界週報》第六三卷第二號，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二日出版，一六—一七頁。